

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及其野逸倾向

申屠青松

(浙江师范大学讲师, 文学博士)

【摘要】清代宋诗选本的编撰以浙人成就为高,表现在文献取材广、规模大、质量高、影响深远,奠定了清代宋诗文献的基本版图。浙江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民族底蕴、浓浓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经济发达人文阜盛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主要原因。受历史形势和地域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出浓重的野逸倾向。

【关键词】宋诗选本;浙江;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1)05—0018—05

诗文选本不但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也是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蕴藏着丰厚的文化信息。立足清代文化的地域性,可以深入探析清代浙人宋诗选本的成就与特点。

一、清代浙人整理宋诗文献的成就

宋诗文献的整理在清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浙人贡献尤大。以重要的选本和总集为例,现存大约五十余种宋诗选本中,出于浙人者有11种,即吕留良等《宋诗钞初集》,陈訏《宋十五家诗选》、周之麟、柴升《宋四名家诗钞》,陆次云《宋诗善鸣集》,潘问奇、祖应世《宋诗啜醪集》,邵畧《宋诗删》,郑弑《宋诗选》,马维翰《宋诗选》,曹庭栋《宋百家诗存》,顾廷伦《顾郑乡先生宋诗钞》,董沛《甬上宋元诗略》,管庭芬、蒋光煦《宋诗钞补》等。已佚者8种,分别为曹溶《宋诗选》,周斯盛《宋元诗选》,王先吉《宋金元诗选》、吴兴祚《宋元声律选》、沈树本《唐宋六大家诗》、童槐《宋诗评选》、张庚《宋诗选》、朱休度《宋绝句选》等。加上虽名“纪事”,但亦具选本性质的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计约22种。这一数量虽不算多,但进一步考察,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文献规模与质量甚或社会影响等方面却是其他选本无法企及的。

首先,文献取材广,规模大。清代选本中,收宋诗超过2000首的凡有10家,其中出于浙人者就占了7家。《宋诗钞初集》收诗凡84家,一万二千余首;《宋四名家诗钞》收诗4家,约2506首;《宋十五家诗选》收诗15家,约3413首;《宋诗钞补》收诗凡百家,约2780首;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收诗百家,厉鹗《宋诗纪事》收诗更高达3596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收诗亦有三千余家,约八千余首。在选本规模上超过《宋诗纪事》和《宋诗钞初集》的非浙江选本,只有张豫正等辑的《御选宋诗》,收录诗人凡882家,但此书出于“御选”,并非私家著述,且刊刻数量有限,流布不广,影响有限。所以,浙江宋诗选本的文献规模在清代极为突出。

其次,文献质量高。由于有明一代的忽视,清代宋诗文献相对其他朝代,散佚情况更为严重,所以,清人选编宋诗,多有文献难觅之叹。清代不少宋诗选本的编撰模式,基本上是以几部前人总集为基础,再辅以少数宋人别集,兼采诸诗话、笔记、

收稿日期: 2011 - 06 - 0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代宋诗选本研究”(编号:09YJC751082)的阶段性成果;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厉鹗年谱长编”(编号:11JCZW16YB)的阶段性成果。

方志等书。这种编撰模式文献来源相对狭窄，所收诗歌往往转相稗贩，不免以讹传讹。相较别的选本，浙人编宋诗选本在文献来源更为广泛，原始文献的选择更为精善，编撰态度亦更为严肃。如厉鹗为撰《宋诗纪事》，将当时最著名的藏书楼若马曰瑄小玲珑山馆、赵昱小山堂、吴焯瓶花斋、吴允嘉石仓、鲍廷博知不足斋等相关藏书批读殆遍^①。因其取资多方，钩隐索微，蔚成大观，四库馆臣才说：“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短长也。”^{[1] (p. 2760)}再如《宋诗钞初集》凡 85 种诗钞，绝大多数是根据宋人别集辑录而得，今考其中可知较准确底本者约 60 种，出于明刻者约 41 种，出于抄本者约 19 种，出自宋刻者凡 3 种^②。这当中有不少是非常珍贵、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本子，如唐庚《眉山诗钞》和苏舜钦《沧浪诗钞》，在版本系统上，它们与现存唐、苏集其他版本都完全不同，故具有别本所无法替代的校勘价值，其中《眉山诗钞》还有一定的辑佚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宋诗钞初集》编撰态度比较严谨，校勘质量极高，如以晁冲之《鸡肋集钞》为例，其底本为《鸡肋集》崇祯间顾凝远诗瘦刻本，两者异文仅有 8 处，而《鸡肋集钞》凡 9431 字，异文率仅为 0.8%。所以，《宋诗钞初集》在版本、辑佚、校勘等方面具有很高价值。

再次，社会影响大。清代宋诗选本虽然数量众多，但影响最大的却集中在三部浙人编撰的选本上，即《宋诗钞初集》、《宋百家诗存》和《宋诗纪事》，这构成清代甚至是《全宋诗》以前宋诗总集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体系。梁章钜即称阅读宋诗，除“名家专集”外，“则泛览吴之振之《宋诗钞》、曹庭栋之《宋诗存》、厉鹗之《宋诗纪事》足矣。”^{[2] (p. 1980)}郑孝胥亦云：“惟吴之振之《宋诗钞》、曹庭栋之《宋百家诗存》为两宋诗人菁华之所在。治宋诗者，孰能舍此？”^{[3] (《宋诗钞》跋)}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清代选本，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三种著作作为文献来源编成。除了文献影响外，浙江宋诗选本文学上的影响也非常大。如蔓延康熙时期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宋诗风，很大一部分即得益于《宋诗钞初集》的推动，宋萃就说：“先世予友石门吴孟举有《宋诗钞》行世，学者靡然趋之。”^{[4] (p. 1)}一部选本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当然，清代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非浙人编宋诗选本，影响也非常大，如乾隆《唐宋诗醇》、姚鼐《近体诗钞》、曾国藩《十八家诗钞》等，但都是通代选本，并不专选宋诗。

清以前撰辑的一些宋诗选本、总集也是经过浙人整理、重刊而得以流行，其中最要者当数陈起《南宋群贤小集》和方回《瀛奎律髓》。陈起编撰的宋人小集在清代大部分时间，只以抄本形式在藏书家中流传，乾隆时杭州藏书家吴焯始据宋本及各种抄本汇录成 64 家。嘉庆六年(1801 年)，石门人顾修将之付梓，此书始有较广泛的流播。《瀛奎律髓》在明代和清初便没有很大的影响，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石门人吴宝芝刊行是书，才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总集，在宋诗话整理和宋人别集的评注方面，浙人的作用也是首屈一指，兹略举数例。如现可考题为《全宋诗话》者凡有 6 部，分为林衡、沈荣本、沈炳巽、钟廷瑛、孙涛、张宗祥所撰，除林、钟二位外，其他 4 位皆为浙人。清人对宋人诗集的评注主要集中在苏轼身上，可考者凡 7 种，其中浙人就占了 5 种，即查慎行《苏诗补注》、陈兆仑《评注苏文忠公诗》、汪师韩《苏诗选注笺释》、冯映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

总之，清代浙人撰辑宋诗选本，在文献规模、质量及影响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诗话之整理，诗集之评注，亦地位突出。可以说，清代宋诗文献的版图基本上是由浙人奠定的。

二、清代浙人热衷整理宋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原因

宋诗在清代的复兴，有其客观的原因。从文化氛围看，清代本身就是古典文献大整理、大总结的时代。有明一代的轻视致使宋诗文献散佚情况极为严重。因此，文献整理成为清人的学术重心。从诗学发展的规律看，明人学汉魏，学唐，学六朝，皆弊端丛生，只有宋诗是一种相对陌生的诗歌传统，趋新避熟，亦势所必然。另外，清人重学的风气也更容易产生对宋诗的亲近。但浙人对宋诗文献整理给予如此之高的热情，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除了上述因素外，与浙江特殊的地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

第一，浓厚的民族情绪及与清廷的对立、疏离是浙人热衷整理宋诗文献的重要心理基础。浙江是清初抵抗清王朝斗争最为

①《四库全书总目》曾云：“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厉鹗）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
②参见申屠青松《〈宋诗抄〉与宋诗文献——以〈宋诗抄〉底本考为中心》，《中国诗学》（第十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38 页。

激烈的地区之一，遭受到过清廷残酷的镇压。即使在清王朝统治渐趋稳固以后，朝廷也未放松对浙江士人的压迫和控制。清代几起大型文字狱，大多以浙人为目标，如康熙初年的庄廷鑑《明史》案、雍正时期的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等。雍正皇帝对浙人之不甘屈服尤为恼怒，在上谕中屡次怒斥浙省“风俗浇漓”，甚至于因此自创先例，给浙江任命了一个“整风观俗吏”，并停止浙江士人参加科举三年。清廷的镇压和苛酷无疑会加深浙人的对抗和疏离心理，所以，清代浙江学术传统的民族因素一直相当浓厚，清初黄宗羲、吕留良等人强烈的反清思想为人所熟知，同样，在清中期的全祖望、后期的章炳麟等人身上，也很容易看到这种民族反抗传统的遗承。不过，受制于清代严苛的文化环境，人们多不敢直接表达民族情绪，而往往通过借古喻今，在整理历史文化活动中曲折表达。宋代因为历史际遇与明代相似，往往成为清代汉族士人寄托民族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早在清初，“借宋代明”以寄寓故国之思就成为遗民一种普遍的话语策略。诚如赵园先生所说：“明人好说‘宋’，明清易代之际，更以说宋为自我述说。”^{[5] (p. 274)}从康熙后期开始，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和遗民思潮的消退，这种话语形式亦逐渐式微，但浙地由于特殊的政治形态和地域传统，此种策略仍在文人中得到保留。

浓厚的民族情绪一方面使浙人对清廷保持对立、疏离态度，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宋代文化的亲近程度，这种心理可称为“亲宋情结”，这也正是浙人热衷宋诗的心理基础。事实上，浙人对天水一朝的关注，实不限于宋诗，而是扩及到整个宋代文献与宋代文化。许多浙江学者都把宋代文化的研究作为一个主要领域，兹举数位代表者为例，如黄宗羲撰辑有《宋史补遗》、《宋史鉴》，吕留良除编撰《宋诗钞初集》外，又整理刊刻《朱子遗书》、《二程全书》，朱彝尊亦曾有意编撰《宋史》，邵晋涵倾力编撰《宋史》，陆心源辑撰有《元祐党人传》、《宋史翼》等。清代浙江学者的代表之一厉鹗，其学术研究主要就是两个领域，一是浙江地域文化，二是宋代文化，后者的著作如《南宋院画录》、《辽史补遗》、《绝妙好词笺》等。

第二，乡邦情结是浙人关注宋诗的另一心理基础。中国传统文人普遍有浓厚的乡邦情结，清代文化的地域性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方面，浙人亦不例外，许多浙籍学者都把浙江地域文化作为治学重点，杭州学者赵一清就说：“余浙人，宣传浙事，发微阐幽，固后死者之责也。”^{[6] (p. 32)}作为地域学术的“浙学”至清代渐趋自觉，出现了像赵一清《浙学渊源考》、张廷琛《浙学渊源述要》这样的代表性文献。某种意义上，浙人“亲宋”也是其乡邦情结的一种转聚。宋代是浙江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南宋定都临安，更使浙江文化具备一股浓厚的南宋底色，爱屋及乌，浙人对宋代文化自然会比别省人更有亲切感。具体言之，清代南宋文献的整理，大都出于浙人，较著者如厉鹗辑《南宋院画录》，朱彭辑《南宋古迹考》、《南渡寓贤录》，臧寿功辑《南都事略》，陈撰辑《玉几山房听雨录》，邵晋涵辑《南都志略》等。

第三，浙人热衷整理宋诗，亦缘于此地诗坛浓厚的宗宋风气。清代宗宋，以浙江风气最为浓厚，延续时间最久，从明末清初黄宗羲倡其先，绵延不绝，一直衍入民国。黄宗羲是清代浙江学术传统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该地宗宋思潮的鼻祖，在他的号召下，以他的师友、弟子为中心，在清初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宗宋诗派，代表如吕留良、吴之振、查慎行、郑梁等。他还与吕留良、吴之振一起编撰《宋诗钞初集》，进一步推动了康熙时期宋诗在全国的形成与盛行。其后，朱彝尊、查慎行、厉鹗、钱载、沈曾植先后主持浙地坛坫，他们都是清代宗宋诗风的代表诗人。所以，清代浙江的宋诗风气无论在时间、空间及程度上，都是它地难以比拟的。

第四，浙江经济发达，人文阜盛，藏书丰富，为宋诗选本的编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首先，总集和选本的编撰离不开丰富的文献支持，对于久经忽视、散佚情况严重的宋诗来说，尤其显得重要。清代藏书之盛，以江、浙二省为冠，论者有云：“有清一代藏书，几为江浙所独占”，“辗转流播，终不出江南境外者，几二百年”^{[7] (p. 37)}。江、浙二省相较，后者对宋诗文献的搜辑更为重视。从明朝末年开，浙江藏书家就极为注重宋代文献的搜辑，若曹溶静惕堂、朱彝尊潜采堂、黄宗羲续钞堂、吕留良南阳讲习堂、吴之振黄叶村庄、马思赞道古堂、吴焯瓶花斋、赵昱小山堂、汪藻振绮堂、鲍廷博知不足斋、陆心源皕宋楼等，皆以富于宋集而著称。厉鹗为编《宋诗纪事》，遍览江南藏书，显然，离开藏书楼的文献支持，厉鹗难成其事。其次，浙江经济繁荣，交通发达，藏书家不但好藏书，而且喜欢刻书，具备成熟的出版体系，这使得宋诗选本的迅速编撰、刊刻、传播成为可能。另外，浙江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同样为宋诗选本的编撰提供了相应的高水准的创作与阅读基础。

三、清代浙江宋诗选本的野逸倾向

浙江地域文化在清代达到发展的高峰，不但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而且显现出独立的文化品格。这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精神特色不仅体现在编撰宋诗选本的活动上，而且也深深印刻入选本的形式和内容当中。譬如，清代浙江学术具有深厚的史学传统，“浙东学派”人所熟知，史学传统对选本即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体例，现存 11 种浙人编宋诗选本，其中有 10 种采取以人系诗的体例。以人系诗，非以体分次或以类分次，其目的大多正是出于知人论世的史学考虑，是对元好问《中州集》、钱谦益《列朝诗集》“诗史”传统的继承。其次，清代浙人宋诗选本多以文献规模庞大著称，往往长于文献收辑，而短于理论批评，这事实上也是史学传统影响所致。吕留良称自己编撰的《宋诗钞初集》为“诗史”^①，厉鹗称《宋诗纪事》是“搜罗废坠”，为“江湖林藪之士”“复发其幽光”^{[8] (p. 1)}，显然，其落脚点都在于史学。不过，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最明显的特征还在其野逸倾向。

严迪昌先生曾经指出，清代诗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呈现出明显的朝野离立之势^②。宋诗选本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其朝野之争的发展，经历了对立、疏离、最后消融三个阶段。一者由于浙江宋诗选本的繁荣，二者因为浙地相对浓厚的民族主义传统，所以，浙人编撰的宋诗选本成为体现清代诗学野逸传统的集中代表。

清初，主要是顺治及康熙前期，宋诗选本的朝野之争集中体现为对遗民思潮的接受与抗拒，反映出对清廷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即对抗与合作。在清初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宋诗不仅是一种重新发现的、可与唐诗抗衡的诗歌传统，它所承载的文化含义远远超出文学领域。由于宋朝与明朝相似的历史际遇，也因为宋诗浓厚的道德伦理气息，宋诗往往成为汉族士人寄托民族情感的载体，甚至是宣传反清思想的一种工具。所以，清初的宋诗风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遗民思潮的一部分。清初宋诗选本除少部分倾向清廷，拒斥遗民思潮外，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遗民思潮的影响。但一般选本仅限于对遗民道德、气节的抽象赞扬，而浙人选本除此之外，往往进一步渗透了遗民独有的学术理念、人格精神，甚至是情感呼应。《宋诗钞初集》、《宋诗啜醢集》、《宋诗删》是清初体现遗民思潮程度最深的三种选本，它们的编撰者都是浙人，且都有遗民直接参与，如《宋诗钞初集》是吕留良、黄宗羲、高斗魁，《宋诗啜醢集》是潘问奇，《宋诗删》是柯弘祚参与。

《宋诗钞初集》是清初遗民宋诗学的代表。首先，《宋诗钞初集》是吕留良、黄宗羲等人遗民学术活动的一个成果，透着“以诗为史”遗民诗学理念。黄、吕等人认为诗歌反映天地之元气，兴亡盛衰皆寓焉，选编宋诗，借以考察宋人之道德、人格精神，也是对有宋一代兴亡盛衰的历史总结，这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明亡教训的思考总结。其次，《宋诗钞初集》的选诗倾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宗经尚理。《宋诗钞初集》对二类诗人评价最高，选诗亦最多，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和以陆游、宋遗民为代表的爱国诗人，这显示出编者对于儒家经典和理学的归依，重点揭示宋诗的理学精神和道德伦理本质，而最终目的则是鼓励汉族士人坚守民族立场，不与清廷合作。第二，《宋诗钞初集》选诗偏尚刚健，主张自由抒发，这实是黄、吕等人人格的一种投射，盖二人皆性格倔强，对“恢复”心存希冀，故选诗多取宏健，不自卑其格。遗民学术理念和人格精神的投射使得《宋诗钞初集》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特色。

与《宋诗钞初集》的学术和精神取向类似，《宋诗删》亦着力发扬宋诗忧君爱国的主题和倔强不屈的人格特质，感念时事、哀伤故国之作几乎占了 2/3，风格上则多偏于苍凉激越。《宋诗啜醢集》在忧君爱国的主题取向上与二书类似，但在精神取向方面却有所歧异。《宋诗钞初集》与《宋诗删》的编者个性倔强，对恢复尚心存希冀，故能不堕其志，而《宋诗啜醢集》编者思想却比较复杂，他一方面有浓厚的故国之思，另一方面又认为明清易代是时势必然，不可逆转，其在选录诗歌里所显示的精神形态更多是徘徊、忧闷、伤感。《宋诗啜醢集》选诗多及清寒幽峭之作，这一方面与编者崇尚竟陵的诗学思想有关，一方面是其苦闷、伤感心理的体现。

雍正、乾隆时期宋诗选本的朝野之争，在政治倾向上主要体现为拥护与疏离的歧义。一方面，由于社会稳定，国力强盛，歌吟升平、鼓吹帝力遂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普遍呼声，体现在诗学领域就是盛行一时并受到朝廷支持的沈德潜格调诗学。格调

①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六《与高旦中书》：“于诗史诸事，大有所商，谓非兄与冲老昆季共为料理，未易办此也。”“冲老昆季”指黄宗羲、黄宗炎伯仲，揆诸吕氏及黄宗羲行年，所谓“诗史诸事”，是指《宋诗钞初集》的编撰。

②参见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31 页。

诗学强调温柔敦厚，崇尚格调高逸之美，其思想本质就是对统治秩序的顺从与献媚。与此同时，民族矛盾的长期存在，文人队伍的扩大和出路的狭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寒士群体，他们的思想趋向与文化品格与现实政治虽不走向一种遗民式的对立，但却体现出一种冷漠、孤傲式的疏离，这构成乾隆盛世的另一面。寒士疏离倾向在创作中的代表就是浙派、高密诗派的枯寒风气。在宋诗选本领域，体现这种疏离倾向的仍以浙人所撰者为代表，如厉鹗《宋诗纪事》、曹庭栋《宋百家诗存》、马维翰《宋诗选》等。《宋诗纪事》的寒士品格和对政治秩序的疏离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厉鹗将搜罗废坠、表彰寒士作为自己的撰著目的和选诗宗旨。正如全祖望所说：“樊榭之为是，盖意存乎收罗废坠，故荟萃惟恐有遗，正以见诗之有得于风雅之遗者，旁搜远取，不必尽在于大家，而又得其诗以传其人，使不与草木同朽，则亦表章之功所寄也。”^[9]（外编卷二六）用厉鹗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江湖林藪之士”“复发其幽光”。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诗人大多出身布衣，有功名者，亦多仕途蹇涩，所以，所谓表彰林藪实是基厉鹗于自身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而为古今寒士发出的不平之鸣，并试图以文献保存、诗心延续意彰显寒士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品格。这与沈德潜式的葵藿向日、歌咏帝力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浙派宋诗选本从题材选择、审美偏嗜、诗学典范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对寒士身份的高度认同，如寒士诗学题材上多偏于田园、山水之作，马维翰《宋诗选》中大半为此类之什。寒士诗学多尚清，尚寒，尚幽，尚涩，从晚唐到九僧，到江湖，到竟陵，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审美传统的承传。曹庭栋《宋百家诗存》小传评诗即多以此为据，若“清深”、“清峭”、“清俊”、“清丽”、“冲淡”、“清疏”、“清迥”、“清空”、“清苍”、“清润”、“闲远”、“萧散”等词，所在皆是。在诗学典范上，浙派宋诗选本则推崇江湖诗人。若《宋百家诗存》所录百家，2/3是江湖诗人。传为宋代陈起编撰、专录江湖诗人的《南宋群贤小集》更是被浙派诗人广泛传抄、整理、选刻。雍正三年（1725年），吴焯历经10年，始抄成《南宋群贤小集》64家。此后，赵昱、杭世骏、余元甲等先后传抄。雍正九年（1731年），陆钟辉又据吴氏抄本选辑《南宋群贤诗选》12卷。江湖诗人在社会地位、思想情感、审美嗜好与浙派诗人可谓高度合拍，堪称寒士诗人的典型。吴焯《南宋杂事诗》最后一首有云：“名集犹传六十人，湖云江月话津津。”言语间颇有以江湖后身自居之意，这种情感在浙派诗人中应该不是个别的。

嘉庆以后，宋诗开始渐渐风行，晚清尤盛，但宋诗选本领域的朝野之别却渐渐开始消融，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随着社会日益动荡，朝野之间人员的流动相对频繁、通畅，不像从前壁垒森严，思想关注的焦点亦趋于统一。其次，文禁政策开始宽松，文人思想的表达可以更加直接、自由，而不必借助历史以古喻今，宋诗也就失去了曲折表达民族情绪和政治思想的“载体”作用。即使如此，浙地宋诗选本受浙派诗风遗绪的影响，仍体现出相对浓厚野逸品格，如咸、同年间杭州人戴熙选《宋元四家诗》，录林逋、姜夔、倪瓒、王元章四家诗，揆其所选，清寒典雅，实亦不出浙派一路。

结语

综上所述：第一，清代浙人编撰的宋诗选本以其庞大的规模，极高的文献质量，深远的社会影响，在宋诗文献中居于中心地位；第二，浙人热衷整理宋诗文献，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即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强烈的乡邦情结、浓厚的宋诗风气、发达的经济与人文基础；第三，受浙江独特地域文化影响，清代浙江宋诗选本在诗学上体现出浓厚的史学传统和野逸倾向。

参考文献：

- [1]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2] 梁章钜. 退庵随笔 [A]. 清诗话续编 [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 吕留良. 宋诗钞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4.
- [4] 顾嗣立. 元诗选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5] 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 赵一清. 东潜文稿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7] 袁同礼. 清代私家藏书概略 [J]. 图书馆学季刊, 1926(1).

[8] 厉鹗. 宋诗纪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9] 全祖望. 鲒埼亭集 [M]. 四部丛刊初编本. 台湾商务书局, 1967.